

试论经济学教育的“三个结合”

朱妙宽

(中共兴化市委党校,江苏 兴化 225700)

摘要:经济学教育要力求做到“三个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教书与育人相结合。为此,理论上要提高解释力、说服力、吸引力。实践上要注重调查研究。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下功夫,引导学生独立思考,锐意创新。教师要实行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力求成为研究型教师。学生要实行学习与研究相结合,力求成为研究型学生。高校要实行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力求成为研究型学校。经济学既要数学化,又要人学化、哲学化。教师既要做经师,又要做人师。学生既要做经济人,又要做道德人。

关键词:经济学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教书与育人相结合

中图分类号:G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3)01-02-0103-06

所谓经济学教育的“三个结合”是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教书与育人相结合。实现这“三个结合”,对经济学本身,对经济学教师和学生乃至学校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将促进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促进经济学教育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任何学科的教育都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经济学教育尤其如此。这种结合,要做到三点:

1. 理论上要提高解释力、说服力、吸引力。韩愈在《师说》中说:“古人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传道就是传授知识,传承文明;授业就是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解惑就是解释世界,解决现实问题。在经济学方面,面临的现实问题很多。例如,我们讲按劳分配讲了60多年,究竟什么是按劳分配,怎样实行按劳分配?现在付出同样的劳动,为什么垄断行业的收入是其他行业的5倍甚至更多?这当然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但同时也涉及许多经济学理论问题。对这样的基本问题搞不清楚,又怎么能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经济学教学中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回答和解决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还有什么解释力、说服力、吸引力?因此,经济学教学既要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要讲西方经济学,既要讲书本知识,又要关注现实生活,研究和回答现实的经济问题,极大地提高经济学的解释力、说服力、吸引力;同时,要关注理论动态、理论前沿,及时把国内外经济理论上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成果,包括不同体系、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介绍给学生,开阔学生的眼界,提高学生的兴趣,启发学生的思考。

2. 实践上要注重调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极其复杂。经济学教学要面向实践,加强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列宁说过:“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1]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各种西方经济学,都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加以检验、修正、发展和创新。经济学教育要十分关注实践,紧跟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研究现实的问题。2011年中共中央宣

收稿日期:2013-04-16

作者简介:朱妙宽(1941-),男,江苏兴化人,江苏省兴化市委党校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科学发展观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传部理论局主编的“理论热点面对面”所讲的8个“怎么办”，包括物价、分配、住房、就业、看病、教育、协调发展、腐败等问题，都是当前干部群众包括高校师生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也都是与经济学理论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高校师生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参与到这些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解决中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负责执行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对中国部分省市民生问题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我们了解中国的国情民情和中国经济学的丰富、发展、创新有重大意义。但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的局限性，在调查广度和深度上还不够。如果能由教育部（包括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北京大学牵头，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高校师生组织起来，共同进行这一项调查研究，将会取得更全面、更深入的调查研究成果，这对中国整个经济学的发展创新、经济学教育的质量提高、内涵发展和改革创新，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此外，经济学教育中还可以对社会经济生活开展多方面的调查研究。

3. 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下功夫，引导学生独立思考，锐意创新。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说学习必须与思考相结合。也就是说，仅仅有了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还不够，还要把两者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过程就是独立思考，锐意创新的过程。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再多，如果不经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没有一个博采众长、融合提炼、锐意创新的过程，就不能成为学生自己的真知灼见，更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有些世界尖端大学已经有数十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我国所有大学至今还没有实现诺贝尔科学奖的零的突破。我国大学与世界尖端大学的差距主要是在缺乏创新精神上，因此，我们要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并以此为重点，培养“一化三型”（国际化、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的经贸人才。

二、教学与研究相结合

各级各类教育都要实行教学与研究相结合，高等学校的经济学教育尤其要实行教学与研究相结合。这种结合，要做到三点：

1. 教师要实行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力求成为研究型教师。现在的高校教师基本上都是博士、硕士，都有一定研究能力。但是有了这种能力还不等于一定能在工作实践中发挥出来，取得成果。有人说过，教师有两种，一种是混饭吃的，另一种是做学问的。我的理解，混饭吃的教师是把教学只作为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只是照本宣科，完成任务；而做学问的教师是把教学作为一种事业，作为一种乐生的手段，是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灌注进去，力求取得创新性成果、精心培养创新型人才。相信我们现在的高校教师绝大部分都是后一种教师，都会成为研究型教师。同样是搞科研，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了完成任务，为了提升职称、职务，为了个人名利；还有一种是为了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有些人是兼而有之。作为有所作为的高校教师应该成为后一种研究型教师。在经济学方面，现在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何者占主导地位的争论，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的争论，有西方经济学内部的争论，有许多亟待研究和解决的经济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这种情况对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提出了严峻挑战，也提供了极好的发展机遇。任何有理想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研究、发展、创新方面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2. 学生要实行学习与研究相结合，力求成为研究型学生。《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培养的学生创新精神严重缺乏。我国高校教师不仅自己要成为研究型教师，还要培养和带动学生成为研究型学生，要振奋学生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在教学、研究、考试的各个环节上要注意培养、发现、激励学生的创新精神。

3. 高校要实行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力求成为研究型学校。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重点大学才能提出建设成为研究型大学的要求，一般大学不必要也不可能达到这一要求。其实，按照创造学观点，人皆有创造力。

按照教育规律,中小学基础教育应该侧重于传授知识,高等教育则要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加里宁说过:“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应该永远研究着,创造着,奔放着。”所以我们的所有高校都应该确立发展成为研究型高校的目标。当然,提出这个目标,并不一定都能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正如孔子所说:“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所以对所有高校提出这个高标准,要比根本不提这个高标准要好。注重科学研究,发扬创新精神不应该只是教师和学生的个人行为,要成为整个高校的集体行为,要创造人人搞研究、个个想创新的校园环境和学术氛围,要把每个教师和每个学生的创造精神激发出来,协调起来,充分发挥集体力的作用,发挥系统效应的作用,求得 $1+1 > 2$ 的效果,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培养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文魁教授曾经用两句话来概括大学全部工作的实质:“释放教师职业潜能,滋养学生创新潜质”。^[2] 我以为,这两句话概括得很好;而要做到这两点,教师应该是研究型教师,学生应该是研究型学生,学校应该是研究型学校。

三、教书与育人相结合

所有学校都讲教书与育人相结合,我这里再次提出这个要求有其现实的紧迫性和学科的特殊性。关于现实的紧迫性,复旦附中黄玉峰老师在 2011 年 6 月 4 日对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学生专门做了《“人”是怎么不见的?(反思中国教育)》的演讲,我这里不想重复。关于学科的特殊性,我想讲以下三点:

1. 经济学既要数学化,又要人学化、哲学化

对于实现经济学的数学化,已经得到我国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已经有了很大进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化也有一定进展。尽管马克思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从现代眼光来看,数学化还很不够,但是马克思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力求实现数学化。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3] 有人统计过,在社会科学的重大进展中,自 1900 年以来定量研究占 $2/3$,自 1930 年以来定量研究占 $5/6$ 。^[4] 可见,进行经济学的定量研究是一种必然趋势。在经济学上,只要需要运用和可能运用数学的地方,都应该运用数学;不必运用或不可能运用数学的地方也不必一味追求数学化。武汉大学在一个实验班率先进行了培养“经济学——数学双学位”人才的尝试,取得了可喜成果,该班被评为“首届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现代数学有了多方面重大发展。现代数学在经济学中应该大有用武之地;现在还应用得很少。数学的发展创新与经济学的发展创新应该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列宁说过:赫尔岑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5] 我从上世纪 60 年代初的亲身经历中感悟到,当时,私有制消灭了,剥削存在着,剩余价值存在着,剩余价值学说有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创新,发展了的广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是“生命的代数学”。1964 年我曾写了约 6 万字的《生命的代数学》一文,尝试用数学、经济学方法探讨人生价值问题,把人的剩余价值量在一定条件下视为人的价值、人的本质的数量表现。但在当时,人们是不以为然的,国内甚至无人讨论人生价值问题,更不用说用剩余价值学说研究人生价值问题了。经过近 50 年的思考和检验,我仍然认为,这种观点和理论是能够成立的,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应该探索经济学的数学化、人学化、哲学化。下面侧重探讨一下人学化、哲学化的问题。

程恩富教授指出:“现实经济活动与人的主体性,既属于经济学范畴,又属于哲学范畴。……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应当实现‘五化’,即数学化、哲学化、心理学化、社会学化、政治学化。”^[6] “马歇尔认为,经济学不仅是一门关于财富的学问,更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现实经济活动既属于经济学范畴,又属于哲学范畴。在许多经济学大师的著作中,经济学思维与哲学思维交融在一起。”^[7]

尹世杰教授指出:经济学应该是“人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以人为本”。过去很多著名学者都论述了这个问题。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方面的论述就更多了。经济学研究应该由过去以物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

中心,着重研究人,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这才是当代经济学的发展方向。^①

乔新生教授指出:“哲学作为科学之母孕育了无数的学科,但无论这些学科如何繁衍、分蘖,最终都会纳入到哲学的洪流中。因此,经济学的方法可以千变万化,最终目的还是探求人类的价值观。”^②

所有这些论述都充分说明,经济学与人学、哲学有着密切联系,可以相得益彰,相互促进。那么,经济学价值论与人学价值论、哲学价值论有无密切联系,可否把经济学价值论引入人学价值论、哲学价值论?回答是肯定的,但需要作种种界定和说明。

经济学价值论多种多样,哲学和人学价值论也多种多样。乔洪武教授指出:“经济学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西方经济学本身蕴涵着非常丰富的对经济道德的科学认知和价值判断,因而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主要内容既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及其分析工具的教育,同时也应包括经济伦理的教育。”^[8]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就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与哲学、人学上的人生价值论(仅仅作为个人的社会价值的理论)来说,是密切联系、可以相通的。因为二者都是个人对社会所作贡献的评价体系。正如左大培研究员所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本质上是一个为人类发展而设置的评价体系,它在评价个人对社会的作用上将劳动看作唯一的标准,认为个别生产者对社会的真正贡献只能是他所投入的劳动。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关于劳动是人类及其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非劳动者依赖劳动者而生存的观点是最基本的思想,劳动价值论只是他的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经济理论上的具体体现。”^[9]既然劳动价值论是一种评价体系,是评价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的体系,而哲学上的人生价值论也是评价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的体系,所以二者是一致的。事实上,人生在世,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由于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人不能创造或消灭物质,也不能创造或消灭能量。人的贡献、人的价值或人生价值都只能归结为人的劳动,包括提供劳动和消耗劳动两个方面。正是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和人生,没有人生价值可言。同样,没有劳动价值论,人生价值论就只剩下毫无实质内容的空泛议论。正如劳动是人的本质,是人的根本生存条件和生存方式一样,劳动价值论是人生价值论的真正基础和实质内容。因此,人生价值论应该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基础上。当然,作为人生价值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不能局限在仅指生产物质产品和商品的那种狭义的商品劳动价值论的范围内。要对传统的商品劳动价值论在广度和深度上加以发展,在广度上要突破劳动产品的物质性和商品性,把创造价值的劳动从商品生产劳动扩展到一切社会必要劳动,把狭义劳动价值论扩展为广义劳动价值论;在深度上要根据现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把传统劳动价值论加以深化细化量化,并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本内核,吸纳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供求价值论的合理内核,坚持价值源泉一元论与价值决定多元论的辩证统一,使劳动价值论达到新的广度和深度,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并能经受住各种质疑和挑战,立于不败之地。经过这样的发展和创新,在广义劳动价值论和广义剩余价值论基础上创立科学人生价值论就是顺理成章的,也是完全可能和完全必要的。

事实上,目前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已经指出了马克思经济学价值论与哲学价值论之间的一致性。康中乾教授指出:“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的价值理论本身就具有哲学价值论的意义。……马克思的哲学价值论和他的经济学价值论是内在地一致的。”^[10]何萍教授指出:“马克思探讨人的价值时,不仅没有放弃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反而是以对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分析来完成他的价值哲学建构的。……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们把生命价值的研究封闭在人的精神世界,……而马克思则超越了抽象精神的限制,深入到人们的物质生产之中,探讨生命价值的形成和实现。……在马克思那里,实践的价值创造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价值的生产是同一回事。”^[11]

① 参见尹世杰的文章《经世济民 以人为本》,发表于2004年2月10日《光明日报》。

② 参见乔新生的文章《经济学向何处去》于2003年12月12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必须充分利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运用广义劳动价值论和广义剩余价值论,研究人的劳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积累,研究人生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在人生价值论上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就是要用广义劳动价值论和广义剩余价值论观察人、研究人、分析人。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获得了巨大成功,并获得了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学的特点在于,它研究问题的本质,而不是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12]3}这样,“经济分析就为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一直为边沁、康德、马克思及其他学者长期求之不得的统一的方法。”^{[12]19}从而也就能印证萧伯纳的名言:“经济是充分利用人生的艺术。”^{[12]5}贝克尔在经济学上的成就是应该肯定的,但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上的成就是更应该肯定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所研究和揭示的正是问题的本质。只要我们不是作茧自缚,固步自封,停滞不前,而是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使之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发展,在分析技术上进一步完善,在应用范围上进一步扩大,那么,广义劳动价值论和广义剩余价值论就不仅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人生哲学、人生价值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13]925}恩格斯指出:“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靠这种剩余而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发展的基础。”^{[14]538}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剩余劳动都凝结为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3]926}从而具有更大的文明面和进步性。因此,为了推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为了创造和提高人生的社会价值,每个社会主义建设者都必须对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提供自己的剩余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价值就是人生的剩余价值。

2. 教师既要做经师,又要做人师

江泽民同志2002年4月28日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引用古人的话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大学的老师要做传授知识的“经师”,更要做善于育人的“人师”,以自己良好的思想和道德风范去影响和培养学生。^[15]

2011年1月12日,九江学院政法学院“厚德楼”的六层,发生了一起副院长、教授张俊杀死院长、副教授李长江的命案。论水平,张俊是教授,是法学硕士,在这个政法学院科研水平是最高的,发表论文是最多的,但正因为如此,他看不起包括院长在内的学院里所有的人,并因此产生心理不平衡,与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院长反目成仇,到案发时仅仅因为报不报去海南路费的一点小事,居然拿起重物砸死院长。最后,他自己也被判处死刑。这个张俊在教学和科研上可算是一个合格的“经师”,但在做人上却是一个完全不合格的人,更谈不上是什么“人师”,这与他的法学硕士、教授、副院长的身份完全不相称。这个事件当然只是一个十分极端的个案。但是会做学问、不会做人的教师决不是个别的。这就警示我们,做任何工作,更不用说做大学教师,都首先要做人。大学既需要大楼,更需要大师;大师既需要有大学问,更需要有大德性、大志向、大肚量。因此,提高教育质量,首先要提高师资质量,特别是要提高师资道德素质。对教师的道德素质要有高标准、严要求。

3. 学生既要做经济人,又要做道德人

经济学特别是西方经济学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的。经济学界对经济人假设的理解有所不同。程恩富教授不赞成“完全利己经济人假设”,提出了自己“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有所创新。但不管怎样,经济学人都要研究经济人,自己也自觉不自觉地要成为某种经济人,或者是完全利己的经济人,或者是利己和利他的经济人。但仅此不够,还必须同时做道德人。大家知道,亚当·斯密既写了《国富论》,又写了《道德情操论》。所以,经济学教学中,既要讲“国富论”,又要讲“道德情操论”。道德教育不要搞空洞的说教,要贯穿

于经济学教育中。有人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哲学,也是一种经济伦理学。我认为,发展了的广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既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也是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石,广义剩余价值学说既可以揭示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秘密,又可以指导人们树立贡献大于索取的人生观价值观。既然如此,经济学教育完全可以把专业知识教育与道德品质教育、把教书与育人融合于教学与研究的全过程中。

参考文献:

- [1]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1.
- [2]文魁.科学建设大学[C]//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第五届中国经济学教育年会暨院长(系主任)联席会议论文集,2010:59.
- [3]保尔·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7.
- [4]丹尼尔·贝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M]//汤承芳.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9-10.
- [5]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
- [6]曾祥云.经济哲学:哲学与经济学的联盟[J].中国社会科学,1998(5):70.
- [7]程恩富,等.关于经济哲学的笔谈[J].中国社会科学,1999(2):93.
- [8]乔洪武.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经济伦理教育[C]//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第五届中国经济学教育年会暨院长(系主任)联席会议论文集,2010:89.
- [9]左大培.重新理解劳动价值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2(6):9.
- [10]康中乾.价值理论的唯物史观基础[C]//王玉梁,等.中日价值哲学新论.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444.
- [11]何萍.马克思的实践——价值解说[J].学术月刊,2003(5):29.
- [12][美]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5]江泽民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必须大力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繁荣[N].人民日报,2002-04-29(1).

“Three Combinations” in Economics Education

ZHU Miaokuan

(Party School of CPC Xinghua Municipal Committee, Xinghua, Jiangsu 225700, China)

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Three Combinations”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economics education, i. e.,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teaching with research, knowledge-imparting with moral cultivation. Therefore, interpretation, persuasion and attraction should be enhanced in the teaching of economics theories; investigation should be stressed in practice; while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with practice must be emphasized to nurture students’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innovation.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combine teaching with research to become research-oriented while students to combine study with research to be research-oriented, too. The instruction of economics relates not only to mathematics, but also humanology and philosophy. A teacher should be both a knowledge-imparter and a student life’s tutor, and a student, an economic man and a man of morality as well.

Key words: economics education;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combining teaching with research; combining knowledge-imparting with moral cultivation

(责任编辑:于凤银)